

制度变迁与现代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

刘敏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1)

摘要 从1949年以来现代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历程分析, 体制政策变迁对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影响明显。虽然包括人民公社体制在内的许多试图改善农村技术应用状况的体制最终都归结于失败, 但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农业技术推广的组织问题。应该反思的是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所依赖的制度体系及农业技术推广背后的国家权力逻辑。因而, 在分析当前农业技术的发展困境时, 应当将国家的权力逻辑和体制政策因素纳入到分析的范畴。

关键词 体制政策; 农业技术推广; 人民公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权力逻辑

中图分类号 S-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4)02-00652-02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LIU Min (MinZu Oinverstiy of China, Institute of Global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Since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fter 1949,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significant. Although many institutional attempts, such as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was failed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rural technology system ultimately, it cannot simply attribute it to the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We should reflect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reflect the logic of power which behind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Thus, the paper argues that, when we analyze the plight developments of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s to the logic of pow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polic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People's Commune; Household-responsibility system; Logic of power

201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突出了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主题, 并将农业科技发展及其推广摆上国家战略位置。然而, 国家虽然从战略层面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 但农业技术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没有突破。目前, 农业技术推广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为什么一方面广大农村急需农业技术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经济效益, 而另一方面却出现农业技术在部分地区推广困难、甚至失败呢? 笔者无力从学理层面直接回答如此宏大的问题, 但在该问题意识的引导下从体制政策因素, 对1949年以来现代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1 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技术推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长期徘徊于“高水平陷阱”^[1-2]之中的中国农业技术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为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应, 中国政府当局将包括农业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全面纳入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在科学国家化的体制下, 科学资源彻底纳入国家发展目标^[3]。中国政府很快建立起很像样的检验、采用、传播和推广农业技术及农艺革新的一套网络, 不仅促进了新产品的检验和迅速推广, 也显著提高了农民的相关知识和技能^[4]。此外, 由于集体体制在获取信息、投入等方面具有规模经济, 人民公社体制在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方面通常被认为是有效的^[5]。由于农民被组织起来, 农业技术可以依靠政府机构的力量获得迅速推广, 人民公社体制为农业技术的引进提供了新的条件^[6]。

然而,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在经历了一个较短时期的农业技术引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高峰后, 20世纪50年代

末60年代初, 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并带来了一个较长时期农业发展的停滞。面对这次危机, 学者们分别从自然灾害、政策失误、及公社规模过大及管理不当等3方面作出了解释^[5, 2, 7-8], 然而, 林毅夫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 将该问题降维到经验层次的人民公社组织形式。他认为, 人民公社的组织形成由合作社的多重博弈变为一次性博弈, 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力被剥夺了, 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 农业生产率也大幅滑坡, 从而造成了这次危机^[5, 1-29]。林毅夫的博弈论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 如果将该问题放在一个1949年以来制度变迁的视角下来考察, 可以发现, 人民公社的本质是靠牺牲农民利益为工业化提供资源来加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一种制度变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后集体化时期。1978年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然而, 1985年以来进行的以农村流通领域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第2步改革却举步维艰, 集体化时期实行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业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农村长期陷入为城市提供廉价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的储备库^[9]。由“公余粮”演变而来的农业税费从农村汲取了大量资源, 这不仅制约了农业技术的发展, 也直接造成了“三农”问题的严重化。因此, 对于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发展问题的分析, 需放到一个更为长时期的宏观制度分析框架之内。

集体化时期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在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人民公社中进行的。农业技术推广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公社有一整套运作正常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 专门发挥农业技术引进和技术指导的职能。因此, 从历史角度看, 公社时期的技术引进无论是其规模、速度和效益都是空前的^[6]。然而, 农民劳动和农业技术的组织方式改变, 并不能使传统的技术体系挖掘出更多潜力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 甚至会进一步损害农村的积极性^[10]。此外, 即使现代农业技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 如果无视文化价值和社会习俗的差异, 为使用这种技术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族地区的环境、开发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批准号:12AMZ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刘敏(1985-), 男, 湖南岳阳人, 在读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环境社会学、国外社会研究。

收稿日期 2013-12-19

革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而只会造成乡村社会的混乱。

2 改革开放以后的农业技术推广

1978年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基本面貌和运行模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给农业技术推广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舒尔茨强调的在市场引导下为小农引进现代生产要素不同的是^[11],中国政府在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上发挥了绝对主导的作用。林毅夫认为,由于集体制向家庭责任制的转变,制度改革带来了原先传播与推广体系的某种程度的破坏,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创新、推广的投资大规模减少,对农业技术推广带来了负面影响^[5]。由于经济力量分散、薄弱,农民不可能具备增加科技投入的内在动力,土地规模过小,小块土地的分散耕种,也不利于一些大型综合性的农业技术的应用;以分散经营的土地承包方式形成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形式,可能成为妨碍技术变迁的因素^[5]。分散的农户经济也没有足够的物力、财力承担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物质技术装备的任务,农户采用农业科技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更高的机会成本。不少农民在权衡各种机会的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放弃采用农业科技成果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机会。

在农业技术推广困难的具体案例研究上,林毅夫通过对湖南省5县500个样本农户收集的数据显示,农户的教育水平对农户采用杂交种子的概率和采用密度上具有正的和统计上的显著效用,因此,增加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资能促进农业技术变迁^[5]。贺雪峰在研究抛秧技术推广困难的原因时,则认为在于缺少强有力的推广体系,因此他认为要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12]。罗兴佐也认为,国家介入是实现乡村水利有效供给的重要前提,在缺乏国家介入和农民合作的前提下,市场化取向的水利制度改革日益陷入困境之中^[13]。

贺雪峰、罗兴佐等人虽然指出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对于农业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这种观点并不能很好地把握农业技术背后的国家权力逻辑,因此也很难找到农业技术推广中政府利益与乡村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体制政策与农业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如果不将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关于当前农业技术发展的问题分析会显得过于简单。当农业技术被转化为国家能力或经济投入问题时,以外部资金技术投入为基础的体制政策调整并不

能有效把握好现代农业技术供给和乡村社会技术需求的结合,反而导致农业技术推广所产生的负面政策后果不断凸显。

3 小结

综上所述,从1949以来现代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体制政策变迁的影响是明显的。虽然包括人民公社体制在内的许多试图改善农村技术应用状况的体制政策最终都归结于失败,但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农业技术推广的组织问题,应该反思的是农业技术运行所依赖的制度体系及农业技术背后的国家权力逻辑。如果说传统农业的实际逻辑是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地、实践中的反应,那么,科学农业的逻辑则相反,它是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地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14]。现代农业技术推广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拓展和地方性知识的被动变迁,它在改变乡村权力结构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农牧民原有的生计模式。因此,在分析当前农业技术的发展困境时,要将国家的权力逻辑和体制政策因素纳入到分析的范畴。除非清楚地解释农业技术推广背后的国家权力逻辑,并把握好政府利益与乡村技术需求的结合点,否则,将难以找到当前农业技术发展困境的真正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 [1]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90.
 - [2] 赵冈,陈钟毅. 中国土地制度史[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89.
 - [3] 李真真.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体制模式的定位[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6):35-45.
 - [4] 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科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81.
 - [5]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3.
 - [6] 张乐天.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2.
 - [7] ALEXANDER ECKSTEI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Output[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379.
 - [8] PEKINS D H, YUSUF S.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279.
 - [9] 陆学艺. 农村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S1):27-30.
 - [10] 珀金斯.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M]. 宋敏,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250.
 - [11]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
 - [12] 贺雪峰. 理解农作[EB/OLJ]. <http://www.docin.com/p-560263372.html>.
 - [13] 罗兴佐. 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荆门五村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 [14]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 王晓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86.
- (上接第651页)
- 生产逐渐实现区域化、规模化,这就需要收获机械与之相适应。必然要求其农业机械均衡发展,进而实现现代农业的高产、高效、低成本。
- 参考文献**
- [1]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统计局. 2009年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 [2]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统计局. 2010年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 [3]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统计局. 2011年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 [4]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统计局. 2012年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 [5] 广东省农村统计年鉴编纂委员会. 2011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